


章开沅文集

● 序言

章开沅 / 著

【第十一卷】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章开沅文集

章开沅 / 著

「第十一卷」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开沅文集 第十一卷/章开沅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

（章开沅文集）

ISBN 978-7-5622-7017-1

I. ①章… II. ①章… III. ①章开沅—文集 ②中国历史—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0176 号



章开沅文集 第十一卷

© 章开沅 著

责任编辑：刘晓嘉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enupress.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380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定价：80.00 元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甘 英

电话：027—67863220

邮编：430079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督印：章光琼

印张：26.5

版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尊开沅先生， 铜版画， 2015， 易明画



走出老宅

1937年初冬，摄于芜湖老宅。

章开沅出生在安徽芜湖青弋江边这所老宅内。抗战爆发后，芜湖形势危急，章开沅随父母逃难到四川，离开老宅前在大门口摄影留念。前排右三为章开沅。此行入川八年，从此走出老宅。



求学“金陵”

1947年秋，金陵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合影于美籍教师贝德士住宅前。一排左二：王绳祖，二排左三：陈恭禄，二排左四：贝德士，二排右一：章开沅。



昙华林忆旧

2004年6月，章开沅与夫人黄怀玉摄于华师老校区昙华林。这是章开沅夫妇工作多年的地方，章开沅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黄怀玉的世界古代史及中世纪史教研室都在此楼一层。钱基博先生捐建的文物陈列室亦在其侧。



故里寻根

2012年6月，全家湖州留影。章开沅的祖籍是浙江吴兴（今湖州市）菱湖镇荻港村。回湖州寻根问祖是家人多年的愿望。章先生右边是大女儿章明明、女婿董黎、外孙女董昕及其男友于秉彝；章夫人左边是小女儿章雪梅、外孙女陈乐章、女婿陈迎新。



出任院长

1983年底，章开沅被群众推举、国务院任命就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

1984年，与党委书记高原（左）共商校务。

走向世界

1986年3月，章开沅与美国孟菲斯大学校长（前排右）在华中师范大学互签交流协议留影。后排右起：邓宗琦、王庆生、孟菲斯大学外事负责人及王秋来、杨庆德。



组织校友总会

1988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校友总会成立，章开沅致辞。前排右二为老领导刘介愚。



相约桂子山

1995年10月，章开沅与部分弟子合影。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举办建所十五周年庆典，海内外弟子纷纷回到母校，相聚一堂，章开沅颇感欣慰。前排左起：乐正、马敏、赵军、章开沅、莫世祥、马小泉、周洪宇；二排左起：宋亚平、郭国灿、桑兵、王杰、张富强、虞和平；后排左起：林济、高钟、郑焱。



为工友祝寿

1986年冬，章开沅与华中师范大学绿化组姚水印老师傅（右）合影。以姚水印师傅为代表的绿化组几十年勤奋工作，努力创新，为把华师建设成花园式学校立下了汗马功劳。学校领导聘请姚师傅为生物系讲师，并为他隆重庆祝六十大寿。



寄语新生

2004年9月，章开沅为新生作“寄语新同学”讲演后，在党委副书记何祥林陪同下步出会场。近十年来，几乎每年他都要为入学新生作一次演讲。他的演讲成为新生大学阶段的第一堂课。



为“辛亥”立传

1976年，人民出版社编辑林言椒力邀章开沅出面组织撰写一部多卷本《辛亥革命史》，以填补国内外学术界空白。章开沅先后邀请隗瀛涛、吴雁南、刘望龄、肖致治、王天奖、冯祖贻、林家有等多名学者参与其事，又请林增平共同担纲主编。

1977年，贵阳会议后，编写组部分成员在游龙宫洞时合影。左起：吴雁南、林增平、隗瀛涛、章开沅。

经过编写组三年的共同努力，120万字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终于问世。宋庆龄先生应章开沅之恳请，为此书题写了书名。



两岸盛会

1982年4月，中国大陆代表团出席芝加哥亚洲学会的年会后，部分团员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前合影。左起：章开沅、陈德仁（翻译）、胡绳（领队）、美中友协代表、李宗一。

台湾方面出席的学者有：秦孝仪（领队）、张玉法、李云汉、张忠栋、林明德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岸史学家第一次坐在一起开会，会场爆满。章开沅与台湾的张玉法被分别指定为答辩人，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争论非常激烈。两人从此成为好友。



反思“辛亥百年”

2011年7月，章开沅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演讲。



为南京大屠杀取证

1998年5月，摄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档案馆。此馆藏有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全宗，此乃日军侵华、进行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的铁证。章开沅在金陵大学的业师贝德士是该会的创建人之一，而且是最后一任主席。这一批重要历史文献由贝德士带回美国。

会师东京

1997年12月13日，摄于日本东京，右为翻译。世界南京大屠杀研究者云集东京，共同纪念惨案六十周年。章开沅为此会作主题演讲，他列出如山铁证，义正词严地驳斥并谴责日本右翼势力的荒谬言行。



世纪馈赠

2005年12月，章开沅与日本池田大作先生（右）在东京“对话”留影。对话涉及许多方面，主题是强调正确历史观的重要，反对军国主义，促进中日友好，并且共同追求、营造祥和幸福的21世纪。对话录于2010年及2011年先后在日本和中国出版。



教会大学研究

1989年6月，摄于华中师范大学科学会堂。这是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首次国际研讨会，章开沅作为会议主席致开幕词。左为北京大学张寄谦教授，右为英语翻译。



张謇研究

2003年4月，在北京与张謇亲属合影。左起：张绪武夫人、张绪武姐姐张柔武、章开沅、张绪武（张謇嫡孙）、张绪武之儿媳及孙女。这次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章开沅作主题演讲。



受聘“资深教授”

2003年9月10日，章开沅先生被聘为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左为时任校党委书记丁烈云，右为时任校长马敏。

荣休仪式

2014年4月16日，校长杨宗凯颁发荣誉资深教授证书时留影。

88岁的章开沅因身体欠佳，力不从心，主动请辞资深教授，并放弃与之相关的待遇。



同事留影

2014年4月16日，荣休仪式结束后，章开沅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全体同事合影留念。

自序

今年正逢米寿，应该盘点一番自己的生平，这套文集的出版就是在集体帮助下的自我盘点。

我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整整 65 年，但这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终生与史学结缘纯属偶然。

1946 年 9 月进入金陵大学就读，原本报的志愿是农业经济系，因为这是金大的王牌专业，卜凯早已成为知名教授，而我此前曾经在教育部办的计政人员专修班读过将近一年的会计专业。没有想到金大的正式录取书却把我拨归历史系，个中情由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也从未申请转系，因为历史系有好几位良师，他们都对我热心教诲，我不好意思说对史学不感兴趣。实际上我的课余时间多半用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并努力阅读与印第安人相关的文学作品。

我未能完成历史系本科学业，因为 1948 年 11 月进入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原想经过短期培训即奔赴前线，最好是当个战地记者，不料却被当时设在开封的中原大学视为理论人才，就留在校部政治研究室中共党史组。是金大历史系肄业的学历害苦了我，我从此再无任何机会上战场杀敌。

1949 年 6 月，我随中原大学南下，在武汉继续从事干部短期培训工作。稍后中原大学分设政治、财经、教育、文艺等学院，我被划归教育学院，仍然从事中共党史与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工作。1951 年暑假，又随教育学院与已经改制为公立的华中大学合并（以后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后又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并且正式成为历史系教师。最初仍然是教中共

党史等政治课，直到1954年才开始担任中国近代史本科教学的主讲老师。

因此，我常说，是革命为我选择了职业，而职业又使我从家族的历史走向中国的历史与世界的历史。我又常自我解嘲：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通常应该是先恋爱后结婚，我却是先结婚后恋爱。我是在担任历史课老师以后，才逐渐增长了对于史学研究的兴趣。不过，1956年以前主要还是应付课堂教学。试想，一个只读完大学二年级的肄业生，要独立地为大学本科生，甚至为在职中学历史骨干教师开课，而且经常是每周3门课（历史、政治、教育三个系分头上），总共13个课时，那是多么勉为其难。当时，也没有一部完整的教材可供凭借，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只有上册，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也只有一半，此外则为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少量参考书，陈恭禄、蒋廷黻的教材则已作为反动书籍被封存。幸好华师历史系系主任田家农到中央党校学习，胡绳为他们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有一个较详尽的教学提纲，田家农赶紧为我寄来一份，我就按照这个提纲编写简要讲义，印发给学生参考。当时中央强调“厚今薄古”，课时的分配上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古代史门当户对，结果是中国古代史为课时不够发愁，而中国近代史却深感课时过多，没有那么多内容可以搪塞。至今回想起来，我仍时有愧疚。幸好1948年我在南京一所私立高中兼任过世界史课程，多少有点教学技巧，所以无论是本科生还是中学在职老师都还愿意听我讲课，这才不断增强继续教学的信心，并且挤出一点时间进行结合教学需要的课题研究。

中国近代史是个年轻的学科，如同当时国内其他年轻同行一样，初期的研究也是赶潮流，热心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并且花费很多精力研究太平天国的性质与土地制度。直到1960年以后，才真正把精力转移到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196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在武汉隆重召开，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转折。此前我与外地同行学者交往极少，可以说是僻处乡野，孤陋寡闻。正是通过这次盛会，我不仅聆听了许多著名前辈学者的教诲，并且结识了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青年俊彦，我们从此风雨同舟，共同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营建奉献终生。



正是在此次会后，华师领导念我多年苦战在教学第一线，从来没有享受过出外进修的优厚待遇，慷慨地给我两年学术休假，让我借此访师问友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当时，北大与近代史研究所对我都很有吸引力，北大是经过侯仁之亲自联络，邵循正满口答应接受；近代史研究所则是由于范文澜曾经挂名当过中原大学校长，刘大年等已把我看作势在必得的“自己人”。但没有想到更为热心的却是曾任华中师院院长的杨东莼，他在征得华师党委同意后，于1963年春天正式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名义，把我借调赴京协助征集北洋政府时期资料，而北大与近代史研究所只不过是经常联系单位。

从1963年春天到1964年10月，我名义上是协助征集北洋史料，但实际上这方面可做的事情并非很多，无非偶尔陪同章士钊与其几位北洋时期的同僚漫无边际地闲聊而已，真正有价值的史料还是他们自己过去已经发表的忆述。坦白地说，这一年多时间我主要是研究张謇，利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近代史料信札》（即《赵凤昌藏札》）和此前在南通市市委档案室搜集的《张謇未刊函札》等相关原始文献，对照《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等已出版书籍，做系统的史料长编与部分笺注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写成20多万字的传记初稿，这就是迟至1986年才改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一书的原坯。

北京之旅使我大开眼界，我不仅得以充分利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与近代史研究所的丰富藏书，而且得以经常向许多学识渊博的师友问难切磋，这将近两年的进修比我读个学位的收获更大，可以说影响了我整个学术生涯。

在朋友圈中，首先要感谢李侃与龚书铎。我刚到北京时，为接待重点“北洋老人”（如曾毓隽、邓汉祥等），陪同他们住在全国政协临时性招待所（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招待所租用的两层楼），与北京史学界仍然比较隔绝。只有李侃特别热心，因为此前他已与总编金灿然商定，把我与祁龙威等都列入中华书局的重点扶植青年学者计划。灿然虽然生病住院，仍召我面谈一次，多所垂询并给以鼓励。所以每逢星期天，李侃必邀龚书铎一起来看我，多半是在附近的玉渊潭公园紫竹院品茶、抽烟、神聊，中午就



在院中活鱼食堂进餐。当时物价便宜，一餐饭加上二锅头还不到一包中华烟的价钱。那时星期天难得清闲，不谈国家大事，更不谈声色犬马，主要是谈书论学，自得其乐，我从他们那里获取许多学术界的最新消息。大约半年以后，“北洋老人”多已回家，李侃遂按原计划安排我住进中华书局潜心治学撰述。中华书局书库本身就有丰富收藏，有些是还来不及整理出版的大型书稿，如《梁启超年谱长编》，对我写作提供了极大方便。加以当时集中力量校订二十四史，全国史学大家都聚集在公主坟中华书局幽静的原址，作为年轻后辈，请教问难更为方便，其中唐长孺、王仲荦都成为我的忘年之交。正是在中华书局，特别是筹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期间，我才真正开始融入全国史学界。

李侃豁达大度，急公好义，有古君子风。他明明知道我的张謇传稿在来北京以前已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签约，但毫不计较，只要求为“历史知识丛书”写一本《武昌起义》就算交差，而且还给以优厚的稿酬。1964年10月，我因撰文评价李秀成惹祸，中宣部通知全国重点批判，中华书局对我的扶植计划亦告夭折。但李侃对我的友情始终如一，就在我回武汉接受批判并且又患黄疸肝炎之际，他仍不断寄来北京上好小米，供我作为中医药丸的添加剂，使我的肝功能迅速恢复正常。

李侃比我参加革命早，原先曾在东北局宣传部任机要工作，以后来北京调入中华书局任近代史编辑室主任，成为金灿然的得力助手，与中宣部的几位老领导关系也比较密切。也正因为如此，“文革”爆发时他就作为中宣部“黑线人物”横遭批斗；我的另一好友戴逸也因《论清官》一文得祸，大字报铺天盖地。华师历史系有一位曾在北京进修的“造反派”教师，看见这些大字报后联想到我与李、戴关系十分密切，认定我是隐藏在桂子山的中宣部“黑线人物”，甚至把我们在紫竹院把酒论学也视为暗授机宜的“黑会”，公开在大会小会发难，借助所谓群众声势逼迫我“彻底交代”。但是，“文革”10年，我们这些老朋友都是自己做事自己承担，从未牵扯别人以图“立功赎罪”。此所谓道义之交，自有坚守的做人的底线，所以“紫竹院黑会”的爆炸性新闻也就无疾而终。与此相类似的著名编辑还有《新建设》的王庆成、《光明日报》的苏双碧、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



他们都是我推心置腹、放言无忌的密友，我们也都“好汉做事自己担”，从未谗过他人或牵连上级领导。这是我们心知肚明聊以自慰的一点小秘密。遇上这些懂行贴心的好编辑，是我学术生涯的极大幸运。

好不容易熬到1976年，“文革”总算走到尽头。天安门广场人民自发悼念好总理，声讨“四人帮”，尽管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王庆成仍然给我寄来周总理的著名遗像，我挂在床头日夜思念，热泪湿透枕巾。“四人帮”垮台，普天同庆，京师螃蟹涨价畅销，李侃等高阳酒徒更是持螯尽欢。对于我们这一代曾经的“民主青年”来说，“文革”的结束等于第二次解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且自上而下提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学术界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人民备受压抑而又积蓄已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地下的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这是我一生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为丰硕的时期，1981年继合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并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论文。从1979年秋天开始，我又多次应邀前往美、欧、澳、亚许多国家与地区开会、讲学与访问。1990年—1993年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3所大学连续任教与研究共达3年以上，在促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特别是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外学术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效工作，并且结识了一大批风义之交与良师益友，正所谓“环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缘”。

“文革”前后，我的学术理念、方法、路径与风格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非常强调对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阐释，也比较注意区域研究（如江浙）与个案研究（如张謇）。有些人以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国同行或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才发生如此明显变化。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很注意对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的研究，而我自己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社会运动作为整体对象，并没有局限于单个的人物与事件。日本有的学者认为我是大陆学者中较早也较多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其实这要感谢已故